

戴傳賢的一生 (三)

王成聖

當犬養毅的助選員

民國三四年之交，戴傳賢除了勸助 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外，就他個人來說，也曾同時進行幾件饒有意義的大事。諸如民國三年，戴傳賢在「民國雜誌」第一第四號「獨語」專欄中發表專論，提倡文字革命。他指出中國不但政治專制，連文字都是專制的。由於作者的文章寫出來祇供少數人閱讀，而非絕大多數的人所可接受，不求介紹新知識新思想，祇知沿襲陳腐舊套，將斷簡殘篇，反覆炫人，「豈非專制之甚？」因此，他主張將中國文字專制、守舊、腐敗、種種病根一齊推翻，今後的文字應能平易實在，使識字的人都能通曉，以期教育普及，國民智識漸次發達。

日本國民黨領袖犬養毅，係日本有史以來第一位政黨內閣總揆，他在民國三年的那一次總選中，即商請 孫中山先生允准，向我國借將，請戴傳賢擔任他的助選員，戴傳賢曾為犬養毅奔走各地，發表演說，使其對手方幾於慘敗。就因為

有此一事，日本法律特別規定，限制外國人士參加日本的助選活動。

從民國四年起，戴傳賢開始給民國月刊編輯世界大事記，分歐洲、美洲、亞洲三部份，先訂定大事的標準，再逐項記載。又從縱的方面追溯大事之起源，由橫的方面記下大事對於各方之影響。所以這一項工作是很艱鉅繁複的，一個月記述十來條大事，字數恆在三萬以上。

戴傳賢還特地僱了一名日本助手，幫他到圖書館裏去查抄資料，他自己也經常和日本學者教授，討論研究。戴傳賢對這一個工作感到莫大的興趣時，孫中山先生則在密切注視歐洲大戰的發展並自研究歐洲歷史地理着手，兼及近東、中東、遠東史地。九一八事變時的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時在教授大學近東、中東軍事地理學。他的住處和戴傳賢家很近，常常去向 中山先生和戴傳賢請教，想不到他後來竟會成爲日本侵華戰爭的罪魁禍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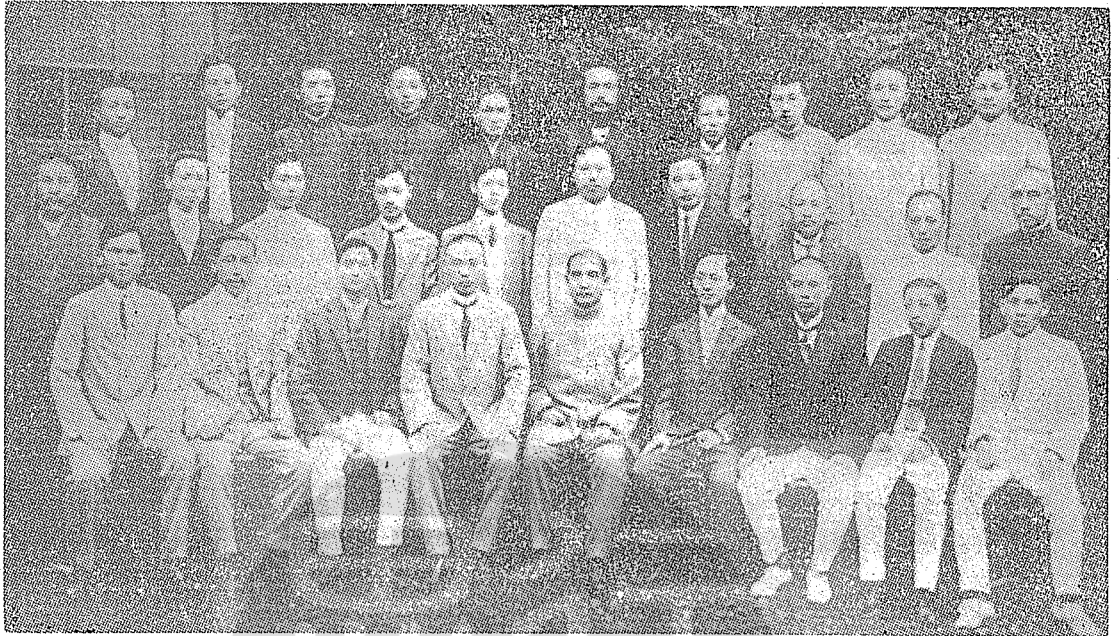
戴傳賢對於世界大事記的編輯工作，曾經準備下十年功夫，完成一部極有價值的巨著。可是

他在東京時即已嫌奔走時多，用功時少，每每有時不我予，力不從心之感。民國五年三月，中山先生返滬領導全國討袁，戴傳賢也隨侍同歸，編輯世界大事記的工作，也就不得不中輟了。

民五討袁之役，戴傳賢仍舊擔任 中山先生的機要祕書，不過他的工作偏重於宣傳方面。袁死黎元洪繼，各省取銷獨立，八月中旬，戴傳賢與胡漢民隨侍 中山先生，應浙江督軍呂公望之邀，暢遊杭州。他曾在都督府的歡宴席上喝得大醉，撞及玻璃窗，頰部受了輕傷。

戴傳賢每每稱道許世英的不輕然諾，那是由於民國六年春他作北京之行時，無意中聽郭泰祺談起，段祺瑞內閣不日即將開會通過參戰案，對於宣戰，戴傳賢深知 中山先生決不能同意此舉，但是急切間又無從阻止。於是他一面電告

中山先生，一方往訪司法總長許世英，請他竭盡可能阻止內閣通過。到了內閣會議之期，參戰案果然擱淺，不兩天 中山先生主張中立的電報，便傳遍了全國。參戰案之利害得失，遂因 中山先生之通電而爲全國人士所訶知。



第起右排前) 凱仲廖與生先山中孫 時立成京東在黨命革華中月六年三國民
賢傳戴及(人六第起右排前) 美其陳、(人四第起右排前) 民漢胡、(人二
。影合等(人四第起左排第二)

六年張勳復辟醜劇，先已有大批復辟黨人在日本多方活動，企圖爭取日本的支持。事關中華民國命脈，中山先生據報後，立派戴傳賢赴日訪晤彼邦當軸各首要，查明日本對於宣統復辟的態度。這一次的日本行，對他個人却有一項離奇的際遇。

民國六年六月十六日自上海啓程，二十一日抵達東京，戴傳賢到東京都是固定的下榻於日比谷公園附近的「旭館」。唯獨這一回，適逢日本議會開會，旭館被日本國民黨籍議員住滿了。戴傳賢只好改住在東京最低窪地帶築地的一家岡本旅社。訂好房間，把行李交給侍役，戴傳賢立刻便前往會晤秋山貞之海軍中將。

秋山時任海軍軍令部長，他是日本海軍界唯一的學者、智囊怪傑。身材矮小，相貌平常；一生刻苦用功，手不釋卷，深受佛教感化，是一個很熱烈而虔誠的神教信徒，奉行純日式的民權神權論。

日本人都說秋山天眼通、他心通，其海軍戰術，曾被日本海軍界人士公認是可望而不可即者。秋山聰明絕頂，學問既博且精，尤能在他的心靈上，化成一種直覺，直感作用。舉世震驚的日俄之戰日艦盡殲波羅底海艦隊一役，就是由秋山以艦隊參謀長，擔任指揮作戰，他曾向戴傳賢透露那一次著名海戰的經過說：

「當俄國波羅底海艦隊東來，我祇每天沉思默想，極意靜坐，我確曾自心靈作用，明明白白的知曉俄國艦隊行動。當時大家都很惶恐，畏懼波羅底海艦隊的偉大威力，而民間更是恐怖的好利害。我自己却有很堅定的信念，深信自己必能殲滅俄國艦隊。以後一切作戰，也都是基於這一種信仰的力量，而非科學的方法。否則，我們決不是波羅底海艦隊的敵手。」

當時，戴傳賢還覺得他所說的，都是玄玄妙妙，半宗教半哲學的話呢？

張勳勾結田中義一

當民國六年，戴傳賢奉命訪晤秋山，他穿過秋山家的花園，直到書房，由於彼此很熟，戴傳賢排闥直入。秋山正在書堆中瞑目靜坐，聽見脚步聲響，睜開眼睛來看了一看，一眼瞥見戴傳賢時，便大吃一驚，把身子往後一縮，指着戴

傳賢說：

「你……你幾時來的？怎麼，你的臉色很不好。」

「我剛剛才到，一住定旅館，就動身到你這兒來的。」

秋山便問：

「你還是住在旭館？」

「不，」戴傳賢搖搖頭答道：「旭館住滿了人，我這回住在岡本。」

秋山又將眼睛闔上，雙手合什，默念了一兩分鐘，再睜開眼來告訴戴傳賢說：

「還好，不要緊，這不是你有什麼禍事。是因為你住的地方不好，那個地方不久就有天災，你快搬到最高處去住吧，低窪地住不得！」

戴傳賢越發被他鬧糊塗了，只是繼而想起，

秋山一向都是這般神裏神氣的，然而又不好意思拒絕他的善意建議，想了想，方說：

「東京最高的地方，要算是六番町的金生旅館了，我搬到那裏好嗎？」

秋山十分肯定的答道：

「嗯，很好，也只有這一個地方可住。」

住處決定了，戴傳賢雙手取出中山先生的信，遞給秋山，等他讀完，方問：

「你看中國的大局如何？」

於是，秋山又一次的閉起眼睛，嘴裏唸唸有詞幾分鐘，再睜眼望着戴傳賢說：

「不出十天，中國將有國體的變更，發生在北京。可是發生以後，不出三天便仍歸失敗。」

戴傳賢疑惑不定的問：

「你能不能說明是什麼樣的變更，將如何發生，怎樣失敗？」

秋山微微一笑的答道：

「以我的能力，現在只能見到如此。往後的事情，且待這個局面出現以後再看吧。」

戴傳賢明知他所說的話大有深意，只不過，對他那種神乎其神的態度，總是不能釋然。便又談了一陣別後閑話，方始辭出。

但他不會忘記，回到岡本旅社，馬上就用電話向金生旅館訂好房間，再吩咐侍役把他的行李送過去，然後，他便往訪田中義一。

主張積極侵華，以田中奏摺擬訂侵華

步驟的田中義一，是日本長洲系軍閥的嫡孫，山縣有朋的家督相續人，時任日本參謀部次長，和秋山同為日本政壇上極有權勢的人物。他的住所是一幢和洋合璧式的華屋，當戴傳賢被導入書房，等田中出來接見時，他看到那間書房的牆上，掛着一付泥金箋的新對聯，上款是「田中將雅正」，下款赫然便是「弟張勳拜書」。

因此，當田中自內室出來，一見戴傳賢在注視那付復辟派急先鋒新送給他的對聯，臉上便現出不安的神色。寒暄過後，他不待戴傳賢說明來意，就自顧自急切的說明他如何反對中國的復辟運動，如何為此特地去見張勳，叫他不可復辟。田中的話越說越長，越說越奇，反倒使戴傳賢覺得好笑。他並沒有說田中與張勳有關，也不會表示懷疑田中唆使張勳復辟，田中竟如此這般大費唇舌的亟亟分辯，這不正就是「此地無銀三十兩」，掩耳盜鈴，欲蓋彌彰嗎？

不過，戴傳賢見過了秋山與田中，已將日本兩大勢力，海軍與陸軍的意圖，動向，摸得很清楚。由而使他对時局的觀測，有了相當的基礎。當時他人已倦，時亦晚，明知和田中多談無益，便起身告辭而去，驅車回到金生旅館。

與胡漢民共讀半年

在金生旅館門口，正是車水馬龍，門庭若市。戴傳賢一打聽，方知「日本的中國復辟黨」，恰好也在金生旅館聚會。復辟黨的所謂肅王派、恭王派、宣統派的頭子，拿了日本御用商人、擁資數百兆的財閥大倉喜川郎之「大倉組」二百萬



擁廢帝溥儀復辟，勾結田中義一的頑固落伍軍閥辯帥張勳。

(三) 戴賢的一生活

日圓運動費，便在東京金生旅館，擺起闊綽場面來了。

當晚，戴傳賢寫了一份很詳細的報告，寄給孫中山先生，調查任務即告終了。他又在東京區逗留了三四天，啓程返滬。便在他離開東京兩天後，東京灣因颶風而起大海嘯，滔滔濁浪，以排山倒海之勢，捲向東京，築地一帶，於是盡成澤國，秋山所說的天災，低窪地不可住，果然應驗，戴傳賢幸而逃過了一場劫難。

接着，戴傳賢抵達上海，秋山的另一項預言又兌了現。七月一日張勳復辟，不出三天，段祺瑞馬廠誓師，義軍猛攻北京，張勳逃入荷蘭使館，宣統復辟煙消霧散。秋山的兩項預測一概應驗，使戴傳賢大惑不解。他向中山先生提出了他的疑問，中山先生告訴他說：

「秋山中將是日本第一個海軍學者，他對於氣象學，原本就有獨到的研究，而海軍軍令部又不斷的收到世界各地氣象報告，什麼地方出現颶風，風力若何？幾時可抵東京灣？他是應該計算得出來的。此外，他又是政府中的最高當局，曉得種種的消息，他在主義上反對張勳復辟，我們去問他，他既不能不告訴我們，而又要顧及他的職責，萬不能隨便講話，所以只好假托神仙，從靜坐默念當中，顯示他的意見。」

戴傳賢這才恍然大悟。

戴傳賢正式担任公職，係在民國六年八月，孫中山先生南下護法，九月一日國會非常會議選舉中山先生為大元帥，開府廣州，任戴傳賢為法制委員會委員長，旋又兼大元帥府祕書長。七

年四月，外交部成立，林森任部長，戴傳賢兼任次長，三項要職集於一身。

七年五月四日，中山先生辭大元帥職，二十一日率戴傳賢等自汕頭取道台灣、日本返滬。按照預訂行程，中山先生原想順道訪台，向台灣同胞發表講演，因此當時台灣同胞興奮欲狂，積極籌備盛大熱烈的歡迎。詎料中山先生舟抵基隆，台灣總督竟千方百計阻止上岸。中山先生不願一切離船直抵台北，台灣總督又禁止台胞歡迎活動，並且發表虛構的消息，誑稱中山先生只在台灣停留一天，翌日即登輪返赴神戶。

孫中山先生一行到上海後，戴傳賢曾舉家遷回吳興，寄寓松雪故園蓮花莊，和張人傑等時相過從。胡漢民曾來作客，戴傳賢和他在瑤瑤樓同窗共讀連半年之久，同志好友朱執信、廖仲愷也不時前來徜徉山水，談詩論文。吳與湖筆天下第一。廖仲愷作書必求名箋佳筆墨，他說：

「我們作窮苦學者，如果連名箋佳筆墨這種好工具也要吝嗇，尙復有何樂趣？」

戴傳賢深然其說，從此以後，名箋佳筆墨，便成爲了他的一項癖好。他終其生都用大小不一的定製印格上等宣紙，毛筆必定是吳興、戴月軒、王一品，墨呢，更非胡開文不可。後來抗戰時期，蘇浙皖淪敵，佳紙名筆好墨不易得，戴傳賢却寧可節衣縮食，以昂值購求，也不願將此一癖好放棄。

經營證券大有斬獲

由五四運動所引起的上海罷市罷工，戴傳賢

是公開撰文表示反對，而曾獲得中山先生嘉許的。他反對罷工罷市，是鑒於上海工人有三四十萬之多，以這麼許多無組織、無教育、無訓練的工人，作素無準備的罷工行動，不但有極大之危險，而且對工人本身至爲不利。從此他熱中於研究勞動問題，寫了不少文章，在「星期評論」上發表。戴傳賢在研究勞動問題時，迭蒙中山先生指點，戴傳賢曾經請教中山先生說：

「現在，這個時代的思想動盪已經到了極點，中國也免不了會動盪起來，但因智識程度太低，一般人不明白世界上思想的系統。那些做煽動工夫的人，就拿了一知半解，系統不清的社會共產主義，在無智識的兵士和工人中傳佈，如果因爲此一無意識的煽動而發生動亂，真是一塌糊塗，沒有辦法了。先生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意見？」

中山先生回答他說：

「這確是一種危險，因爲無論在那一國，他們的各種思想都是有系統的。社會上對於有系統思想的觀察與批評，也有系統。政治運動是政治運動，經濟運動是經濟運動，各有各的系統。都隨着人文進化的大潮流，自自然的進步。如果沒有特別的壓力，像我國從前那樣的政治，決不會有十分激烈的變態發生。中國在社會思想和生活上還沒有發達，人民智識沒有普及，國家的民主建設還沒有基礎時，這種不健全的思想，的確是危險不過。這也是過渡時期一種自然的現象，如果要防止它，反而煽動人的好奇心，助成不合理的動亂。再冷靜一點想，無論在什麼地方，荒涼開時，初生出來的一定是許多雜草、毒草，

決不會一起頭便忽然長出五穀來的，也不會突然出現芍藥牡丹。這種過程，差不多就是思想震盪時代的必然性，雖然有害，但也用不着十分憂慮。

這是「國父全書」中未及選錄的一段高言讜論，至理名言。

民國八年八月，孫中山先生在上海成立建設社，創辦建設雜誌，自任社長。由戴傳賢、胡漢民、廖仲愷、朱執信勳助編纂工作。當中山先生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戴傳賢又提出他自民國五年起草政綱以來的一貫主張：國民黨應以教育、宣傳為基礎，不宜僅祇利用政客作軍政活動。此一主張曾由中山先生親自修正草稿達四五次之多，均因格於眾議，不克實施，使戴傳賢每每引為遺憾。

民國九年八月，粵軍回師討伐盤踞廣東的桂系，餉糈奇缺，戴傳賢竟使中山先生及諸同志大為意外，充份發揮了他的實選長才。在上海兼營證券物品交易所業，居然億則屢中，大有收穫。就靠戴傳賢小試身手，做生意賺了一大筆錢，全部匯解廣東，粵軍方始能够開拔。中山先生非常高興，稱許戴傳賢為貨殖天才！

粵軍討伐桂系節節勝利，十一月一日攻克廣州，二十五日中山先生偕伍廷芳、唐紹儀、戴傳賢、胡漢民、廖仲愷等由滬赴粵，國會議員也相率而至。十二月中，戴傳賢又從廣州叩命北上，抵達浙江奉化，促今總統蔣公赴粵為中山先生之助，然後他回到吳興，再往上海，手擬長達數萬言的廣東法律案，同時繼續經營他的交易

所，在上海、廣州之間往返奔波。

叩命入川息爭弭戰

民國十一年八月，陳炯明叛變，中山先生從廣州回到上海。戴傳賢正在吳興臥病，中山先生命他赴滬相隨。他立即抱病前往，住進孫中山先生的滬寓。不數日，向傳義代表四川省長劉成勳，攜有四川各將領函件，到上海來向中山先生致敬。同時還帶來了四川省議會的公函，以及劉成勳、夏之時等四川首要的親筆函件，歡迎戴傳賢回四川訂制省憲。在四川人的心目之中，戴傳賢永遠都是四川出類拔萃的人物。

那時節，正值中山先生主張和平統一，粉碎直系頭目吳佩孚之武力統一妄圖。同時倡呼兵工救國，以杜軍閥之軍事擴張。因此，中山先生決定派戴傳賢為代表，入川勸促川中將領息兵罷爭，通力合作，使四川實業有以發展。再以四川實業為原動力，以使全國實業獲得發展，達成全國一統之偉業。

戴傳賢很想藉此良機，返里省親，可是他也有不得而己的苦衷。那時節他深感精神恍惚，心力衰退，正不知是否可以如願到達目的地。但是中山先生之命不能不從，戴傳賢唯有束裝就道了。詎料，就由於這一次的巴蜀行，竟使戴傳賢在愛國憂時、百感交集之下，興起了輕生之念，在航向宜昌的輪船上，「一個決心跳下了長江」，幸而天佑斯人，大難不死。關於這一段轟動一時，傳聞久遠的國民黨要人自殺事件，數十年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其中自難免有許多揣測之

詞，附會之說，以訛傳訛的流傳下去，但是最正確的當然要戴氏本人的一段記述，對於他自殺前後的內外環境，身體狀況，心理情形，以及感受過程，遭遇和思想變遷，都有確切詳盡，兼且生動感人的描寫，全文長達八千餘字，可謂為當代最佳的名人自述之一，最難能可貴處尤在戴傳賢的坦率無隱，和盤托出，因此特予抄錄於後：（文中的我，係戴氏自稱。）

「我的精神衰弱，是從民國六年已經種下了病根，民國九年又加一重，到民國十一年，已經病入膏肓了。民國十二年的四川，是由幾個因緣湊出來的。那個時候，我因為母親七十歲，幾次三番想要四川一行，但是不能決定，心中搖移遲疑。當時就是在舊曆八月初，孫先生從廣東回到上海，就打電話來叫我。先生待我是同自己子弟一樣，知我很深，諒我很摯，愛我很切。但是先生最曉得我的毛病所在，所以在一切同人當中，雖然這樣愛我，總不叫我做超過我能力的事情，絕不叫我負一個方面的責任，每回見我，都是非常親愛。那一回我到上海，他就叫我搬到他公館裏住，他叫我選到他公館住的原因，我知道有一個很親切意思。他對有恆是很好的，因為他怕我一個人住在上海，家裏不放心，所以他叫我住在他的房子裏。他的住所很小，我就住在他臥房的對面，書室的隔壁。住了幾天，適逢其會有一個朋友從四川來到上海，這個朋友就是向育仁。他帶了四川各將領的信，算是劉成勳的代表，到上海來問候孫先生的，同時他又帶了省議會的公函，同劉成勳夏亮工的信，還有許多朋友的信，來歡迎

我到四川制省憲法。我遇此機會，四川省親的念又動了。當時孫先生失敗下來，主張兩件事，一件是和乎統一，這是抵抗吳佩孚武力統一而發的。一件是兵工救國，是抵抗各軍閥專事擴張軍隊打仗而發的。先生看見向育仁來，就決定派我回四川做他的代表。先生看到四川位於長江上流，為中國財富之區，第一件是煤鐵五金，第二件是很大發電的水力，所以我回川勸他們川中各將領息兵，通力合作，發展川省的實業，把四川實業做成一個原動力，來發展中國全國的實業，以此做息兵的方法，以此做統一的方法。當日孫先生就在上海把四川的同鄉，各黨各派統統請到他公館裏用餐，發表這一個意思。就那一晚的聚合結果，發出兩個通電來說明這個意思，並且說明要派我去。我這時候，一則想回家省親，二則自己身邊有不得已的苦衷，精神恍惚，心力衰退，很想換一個地方，脫離惡劣的環境，所以一面接受了孫先生的命令，一面接受了四川朋友的歡迎，在舊曆九月初四，就離開了上海。

萬念俱空自沉于水

自從離開上海的一天起，精神一天恍惚一天，所有過去自己行爲的缺點罪惡的影子，通通湧上心來。到了漢口，就遇到了幾個四川同鄉，都是各黨各派的代表，統在漢口劃策，再開四川的戰禍。我同育仁在漢口勸了他們三天，一點也沒有效果。這時我的心裏，廿四分苦痛，而更有一件逼迫我很深刻的，是五六年來一件很錯誤的戀愛，種種魔障纏繞，自己偏偏認假作真，落到一切假象的當中，再也不能明心見性，一刀兩段

，再加看見四川的戰禍迫在目前，一些昏天黑地的軍官政客，都聚在堂子裏的鴉片煙燈旁邊，籌劃殺人放火的事業，甚麼政治實業教育這些問題，決不能夠引起他們半點注意，公私交迫，我覺得公私的前途，都無半點光明，於是死神就伸出他的魔手，拚命來招我了。本來我的回川，已經是在十分神經痛苦的當中生出來一點新希望。一則有多少新事業的趣味，二則可以達到我多年四川省母的目的，三則自己可以離開惡劣的環境，在精神上另造一個蹊徑。及至在漢口遭逢這樣的境遇，不知不覺的把一切都丟得乾乾淨淨了。搭了招商局快利輪船到宜昌，同船有向育仁陳鳴謙顧宜之同我自己帶的書記和我的當差。上船之後，一刻煩悶一刻，生趣一點沒有。在船上胡思亂想，人家向我說話，我也聽不見，四圍的景色，我也看不見，完全癡呆了。向育仁同陳鳴謙似乎有點警覺，恐怕我精神有非常變故，時時刻刻留神我，一步一步跟着我，留心我。及至將到宜昌的一天，煩悶越到了極點。早晨沒有起床，早飯中飯也沒有吃。午後育仁走到我房中，說許多道理和我解悶。他最要緊的話，是大丈夫作事，當光明磊落，可作即作，不作即止。要作就要大刀闊斧去作，不作便放下來，萬事通同不要去問他。憂愁煩悶是最無價值的。人非生即死，生死皆有價值，惟獨憂愁煩悶，沒有一點價值。育仁講的一席話，是使我鼓起勇氣，大刀闊斧做去。但我已衰敗至此，再也打不起精神。雖然聽見他的話，都是些至理名言，我心中忽然開朗，將所有憂愁煩悶，一概丟開，但死的決心便定了。我的

同行者，育仁宜之鳴謙三位朋友，絲毫沒有知道，育仁也以爲我是完全聽了他的話，要大刀闊斧做一番事業，望生路上走，却不曉得我已決心了，我的決心，是在另一方面。那晚他們三位在我房中談了許多的話，使我非常快活，到得十一點鐘，他們已經睡了。我獨自一人走出房艙，到他們的房中，看見他們已經睡熟，我就走到船的後面，一個決心跳了下去。這個時候，我遠遠看見船邊上立着一個人，看我跳下去，下水之後，船後的轉輪挑動的波浪，將我翻了兩翻，但自己仍覺得很安穩的坐在水上，腰部以上全露在水外。此時我心裏非常光明，乾乾淨淨，無半點塵埃，望着西方叩了三頭，就算是對成都的老娘辭別，同時看見我坐的輪船上的電光漸漸的隱微了，我又重新向東方望了一望江浙的家庭妻子以及親朋舊友。在一剎那間，轉念一回，心中想從此罷了。至此以後，萬念俱空，就想沉下水去。但是越要沉越不得沉，想鑽下去從對面浮起來，向左上浮，向右右浮，把頭埋在水中，拚命的飲水，但肚皮已飽不能再喝。只有聽天由命，站在水裏，很清楚的覺得我站在水裏成二三十度的傾斜，兩肩以上完全露出水面，這時是九月廿二二的光景，天氣已經很冷，我身上穿的一件花緞薄棉袍，裏面是衛生絨衫，長江的水，已經完全將他浸透。我一點不覺得寒冷，頭部露在水面，習習江風吹來，使我心地清涼只覺得舒服，一點也不覺得痛苦。民國九年以來，三年當中，一切煩惱罪惡失意憂思通同付與長江的水流得乾乾淨淨。天上是漆黑的，星光被浮雲所遮，一點都沒有

。兩方離岸太遠，從黑越越當中，一點也看不出甚麼，只覺急流的江水，從肩頭把我往下送，這個時候，我忽然望見在我的四圍，有一圈很圓的白光，從水面射到空中，越近越濃，越遠越淡，此光離我有好遠，不得而知。我從小隨着母親，就有佛教的信仰，雖然在入世的當中時，把信仰忘却，到此時深刻的信仰心，又自然的發現出來。看見這個白光，心中忽然感動，確實這個佛光，是我的生機，我一定不應死應該要生。這個時候，天上漸漸露出星光來，兩邊的岸，也隱隱約約看見，一邊是很淡遠的蘆葦沙灘，一邊是很高的土壁。此時江上的冷風，一陣一陣吹來，侵入肌骨，我自己完全凍僵，不省人事，怎樣去到甚麼地方，我已不能記憶。後來覺得睡在一家鄉民的天井裏，是被救了。四圍有許多男男女女圍着，大約有十幾個人，自己睡在很厚的稻草上面，濕衣已沒有了，上面蓋的是些稻草和敗絮，有一個老翁給我一碗酒吃，四面周圍離幾尺遠都燃着稻草，我心裏很明白遇救，但是一點說話的能力也沒有，昏昏又睡去。一直到了次日早晨，約有九十點鐘方才醒了。這個老翁和他的家人，已經爲我預備了早餐，我同老翁兩人聚餐，這個老翁姓齊名順發，年紀約有六十歲光景，面貌很平和端正，隱隱現出來他正直光明的氣概來。他問我的話，我也不便據實回答，他也不便告訴他的真實姓名，祇隨便說我是商業失敗，所以投江，他勸解我許多，問我要往何處，我說我要到漢口，他就預備送我到漢口的川資，我家裏什麼也沒有，祇剩了幾斗麥子，他想到市上賣一斗麥子

，把賣來的錢送我。因爲他夫人幾次三番的反對，他也沒法，尋了半天，尋出來一張一吊錢的錢票送我。並且說，我們地方不太平，晚上我去打魚，留你一個人，很不方便，不如送你到我的親戚家去住，我親戚離我家祇五里路，就是枝江縣境，我的親戚，很能招拂客人的。到了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我的衣服已乾了，換了衣服，同他的兒子望枝江縣去。這老翁住的地方，叫做黃土坡，從黃土坡到枝江縣的道路，是很平坦的，沿路風景非常優美，小山叢樹，夾着許多很清潔整齊的人家，說明此地是最和平富庶之區。只是在路上看見三三五五的散兵，都是十分頹喪的樣子，曉得他們此刻的境遇，也不見得好。

三十壯年一衰至此！

『到了枝江縣老翁的親戚人家，這人家住在兩開間的茅舍裏，門前搭着一個很大的蘆葦棚，是碼頭上賣茶的所在，也就是老翁親戚的營業。我們到茶館的時候，天色已晚，茶客一個也沒有，老翁的兒子遂到茅舍裏告訴之後，就走出來一個滿面笑容的人，好像是迎接貴人的樣子。同時現出他們舉動很祕密，很不願意把我落水遇救的事叫人知道的样子，他陪我到他家裏，他家裏有一夫一妻一女一兒媳，他的兒子聽說是出外謀生去了，他的家人個個都非常熱誠而天真爛漫的。主人拿出一張大紅的片子，上面印了三個大字，好像前清翰林院用的一樣，上寫着楊開錕。我看見這張名片，心裏轉念，照這樣窮苦人家，又在這個時代，決不能用這種大紅名片，當然這位主人；是碼頭上當家無疑了。主人請我進屋之後，天

色已晚，打了一個火把，到街上去買酒買菜借被褥，不多一時，他回來了，肩上擱着被褥，一隻手提着酒壺，一隻手提着猪肉粉絲，交給他的夫人，叫他夫人預備我的臥具和晚膳。一會喝酒的時候，主人對我說：我們此地是小碼頭，招待恐不能周，如果你要到漢口，到了沙市，就是大碼頭，那裏的當家是我的拜弟，我明天拿片子叫船上的人去招呼，並且託船上的人送你到沙市，那邊無論什麼，都比此地方方便，就是招待十天半月，也不爲難。他口氣雖然粗俗，却是英氣勃勃。再看他面貌約在三十多歲，和齊順發完全相反，兩道劍眉，一雙橫眼，腰圓膀闊，表現他是一個江湖英雄的氣概。但是他的家裏的人，却個個慈善得很，而且都克勤克儉，當中房裏放了一只木織機，一個紡花車，這就是他夫人兒媳女兒度日的工具。談了很多的時候，我也疲乏了，就地當中屋裏，打起牀舖來安息，次日早晨起來，他又預備了很好的早餐，有酒有肉，真是難得。午後一點鐘，由宜昌開到沙市的輪船到了，楊先生自己替我買了船票，送我上船，正在招呼船上水手對我要特別優待的時候，忽然看見隨我的書記當差，同那一個毛副官，都從這隻船上岸，我也上岸。原來他們來尋我的目的，是要尋我的屍首的，忽然見我，驚奇得很，真是所謂驚喜交集了。問起原因，才曉得兩天的經過。這一件事，是我生平一個很大的奇蹟，也是我一生一個很大的關鍵，我所以精神頹敗至此，會走到這條路上，這是說明我半生浪漫的歷史，我不能自治，不能事種種因收果，慎始全終，所以煩惱至極，弄到這

種境遇。就此一件，我的半生過去的歷史，都可以說明無餘了，由這一個奇遇，我們更看清楚中國民族的生機，決不在搢紳先生們當中，實在和平和的農民豪傑的江湖朋友刻苦的工人裏面。中國民族幾千年付下來的高尚優美的道德，也是只有在這平民社會裏面才看得出來。我們政教中人，此時不努力做實業教育，培養這些生機只是爭權奪利，鬥氣私爭，真是良心所不容的了。至於一些盲從着幾句西洋的共產口號，借來遮蓋自己個人性慾食慾的放縱的共產黨人，說甚麼為無產階級謀幸福，為世界人類造文明，真是一羣野獸。這樣下去，真要把中國民族僅有的一點保存在平民階級裏面優美德性也都破壞乾淨，造成洪水猛獸的世界。回想當年我們糊糊塗塗，把中國人民優點，看得太輕，胡亂輸入西洋的學說，以為便可以救國救民，不只是太過無識，而且真是十分罪過。西洋的文明，我們應該要努力輸入的，是純正的科學，不是淺薄的哲理，是實業的建設，不是道德的破壞，我們看到的齊楊兩位先生的高尚優美可以了解真正革命意義了。這時候在宜昌的向育仁先生，悲傷憂愁到了極點，但是他是一個有勇有謀有實力的人，當船到了宜昌，發現了我失蹤的時候，如果在旁人，一定忙亂得不知所為，他查遍全船找不着我以後，他把我離上海後精神狀態，想了一想，他就決定我是走到自殺的路上去了。立刻叫了船上的水手頭腦，和民船的太公，打聽宜昌下流的水勢，何處有灘，何處有迴水，何處有支流，他打聽的結果，知道由枝江到沙市當中，有一個很大的迴水，凡是上流衝下的東

西，必定流到這個迴水裏，決不能流到別處。當我落水的時候，的確有人看見，但是那個人有很奇怪迷信，以為在看見人家跳水時候，不可叫喊，恐怕我替死的水鬼，要找着他，所以他看見我跳水，一聲也不響，仍舊去睡覺。及至次日育仁等查詢的時候，方才說出，（這一種打算的魔鬼迷信，真是中國民族的毒藥，如果不建設高尚的信仰，中國的民族真無救了）所以育仁更可以斷定，是十二點左右的時候在宜都縣落水的。育仁這時僱了民船，先派人到宜都一帶尋覓，又託宜昌官廳通電宜昌沙市團防軍警沿途尋訪。自己住在宜昌，一面為我預備後事，一面打電上海成都重慶，這種朋友，真所謂死生之交了。

奇異暗示 切實懺悔

「我自經過此事之後，精神依然沒有恢復，在川中一年，看見種種雜亂的景象，想起當年民權報時代，自己過於鼓吹殺伐的言論來，覺得自己對於離亂景象，不能不負重大的責任，而自己又在無可為力的當中，時覺的悲傷精神的衰退，也就與日俱下。直到從四川出來以後。近兩年當中，所有遭運，可以說沒有一件事是我願意作而作的，沒有一句話願意講而講的，沒有一篇文章是願意寫而寫出來的。都是在不得已境遇隨着命運的支配，和歷史的感情，無精打彩的做了下去，所以隨時都是走了一步懶一步，和一天煩惱一天，我的思想從此時起，祇有回頭的感，沒有向前的勇氣。當我在峨嵋山的時候，我想了兩句話，叫做「隨緣了宿孽，切莫結新冤」，出川以後，一切的經過，都是努力去保持這兩句話，誰知這兩

句話，正是半不通的迷信，自己斷送自己。即如在孫先生死後，因為種種事實的指示，和責任的感覺，作了幾本小冊子。當時也有批評我，說這是我結的新冤，但是在我的精神上，到底只算宿孽。我的精神狀態，還是在了宿孽的狀態，偏偏歷史的推移，已經真到了我的了宿孽的時代，我自信我的主張和見地，是毫無有偏見和私心，然而竟不能使一般同志們，得因此而生圓滿的結合，我的為公共工作的勇氣，由此消失大半。但是雖到今天，我對於所著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一書，自信解釋孫文先生之思想，確實是很確當的。其他批評黨的組織問題的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自信也不是完全錯誤，或是在行文上，有過分偏於主觀的感情的地方，然而也都是由真實的事實觀察而起。至於這一本書的理論，發生不出好影響的緣故，第一不能不說是由於從前國民黨同志，缺乏思想的訓練與組織統一的工作，第二便是中國民衆之革命的要求，被過去十幾年當中的軍閥政治逼着去走偏激的道路，於是趨附功名，迷信外力，縱慾敗度的共產黨，乃後以國民黨當中，運用國民黨的同志，甚至國民黨的忠實前輩，來壓逼我這可憐的努力，當時吳稚暉先生對我說，革命黨必不可反對最激烈的一派，這樣的行動是不祥的，我因為自己自信力不堅，而又素來信仰吳先生，覺得這話的確是至理名言，把我僅有的一點信心，也却了下去。有一個青年，他說近三十年中，沒有比我所著的兩本小冊子影響更大的著作，但是遲了半年，所以不見其益而見其損，假如在早半年的時候，孫先生在時，一定

無論是新舊的黨派，都可以得到相當的了解，而獲良好的結果，這些是非非，現在不去管他，我只認作自己少年學識不足，修為不充分的果報。自從去年十一月從北京回來之後，我就決意不再問政治，當時我很自己了解。我自己精神狀態，已經是不能夠担当新事業創造，所以發表謝職的宣言，很確實的說，這是我半生歷史決定的結束。回想在過去十七年當中，我自己在中國歷史上，的確負了很重的使命，許多事業的造因，完全由我而起。但是所有我過去的事業，盡是只有播種，而無收穫，只有造因，而無結果。本來凡事有播種的，一定有收穫的，可是在我事業當中，慎始全終的事，一件沒有做過，這一個缺點，我很知道一半的原因，在同國的環境一半的原因，在自己的修為。歸結起來，還是不能刻苦的為誠信而犧牲自己努力前進。照我自己內的認識，以我的聰明和才力，倘若沒有修為的缺點，不造了些浪漫的罪惡，應該為民族為世界為人類多作許多的事業，不至於在三十多歲就衰到如此，這是我一生抱恨辜負了自己的地方。

『孫先生說，先知先覺是發明者，後知後覺是宣傳者，不知不覺是實行者。當先生在時，很能知道我的短處，所以一定不要我負責實際的責任。因為他知道這個是我不能做的。有了這許多對於過去的認識，所以在今年我卅七歲初度之時，那一天心裏感覺到一種奇異的暗示，要我切實懺悔，六祖說懺是懺過去，悔是悔將來，我在這個時候懺悔的精神，的確很圓滿的。但是努力向上奮鬥的精神，已被過去內外的惡因緣，消磨得乾乾

淨淨，所以一刻一刻，自己想鼓起勇氣，直到這一次經歷一個很悲傷的精神狂亂，凡是一個人，種了一個因，一定要忍勞耐苦，痛做耕耘的工夫。如果不然，則後來留得許多自己的痛苦，良心譴責，這是甚麼人替代不了的。即就為善來說自己種了善因，自己一定要去努力耕耘，種的善因愈大耕耘的工作應該愈勤，不然種的善因愈大，自己的罪惡的責任也愈大，因為善是積極行為，只種了善因，而不能積極修為，自己便負棄善不為的責任，棄善不為，便是惡，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真實意義。古人說，天定勝人，人定勝天，天道不可知，我們不必去求知，在人生的行程中，強要求知不可知的天道，這是自己怠惰修為的表示，求知的結果，不能得覺就會得迷，我們要曉得一切世間公認的理法，就是天道的表現，我這一次精神的狂亂的當中，忽然認識出一個天道不可知，道即天道的原則來，我在這當中的確認識出一個必然的天道來，但是同時認識出當然的人道，正和必然的天道，是成正比例的。

所以我不願向大眾說必然的天道，只願拿當然的人道，自責自懺。就道德說，就是道德，就宗教說，即是信仰。天道雖不必求知，而人道可知，認定可知的人道去努力，實行，結果就是人定勝天。人也是天的一份，忘了人道，就是忘了天道，結果一定是悲哀而不是快樂，是失敗而不是成功。這幾個月來，我感覺到我的精神，差不多陷於不能恢復的境地。但是在痛苦當中，一線良知，依然不斷的活着，這個痛苦的呻吟，即良知的光明和私慾交戰，忽然由一個自己暗示，認識出

復活的知路，是在自己很坦白地負應該的責任，便自己很自得地快活起來，歡喜到被人認為狂亂的程度。一切過去的因緣，此時都看得清清楚楚。讀我這一篇懺悔文的人，要曉得正面是我良心的認識，反面是我行為的矛盾。』

以上是戴傳賢自述跳長江自殺遇救慶生的經過。當年，戴傳賢投江自殺的消息傳出，自中山先生以次，國人震悼驚駭之情，恍如在平靜的湖面之上投下一方巨石。然而，過不了幾天，又傳來了戴傳賢自殺獲救的佳音，確曾構成民國十二年政壇上的一齣悲喜劇。上海有一位名士，惜忘其名，聽說戴傳賢自殺，涕泗交流，悲不自勝，揮淚寫下哭戴傳賢先生詩若干首。不久又獲知戴傳賢被江畔漁翁救起，得慶復甦，他欣喜若狂，又將悼詩改成了賀詩，事為戴傳賢所知，特將悼詩、賀詩全要了去，製成四幅屏條，懸在成都少城四道街廡所，作為這一次死而復甦的紀念。（未完待續）

本誌十六卷四期，六十三年十月號，第八頁第三欄倒數第七行起：「在客籍學堂戴傳賢頗蒙兩位名師的青睞。丁汝昌係「丁師汝（昌燕）」手植字之誤，丁汝昌是安徽人，丁師汝籍隸山東日照。謹此訂正，諸希讀者垂察。

編輯部啓